马克思主义研究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深蕴

郗　戈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以实践活动的自由发展问题为理论枢纽,马克思得以将自由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化发展自由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再现,揭示了资本逻辑中孕育的自由王国之生成趋势。马克思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两种活动领域历史地区分开来,又共时性地关联起来,从而设定了一种人类活动的自由等级。在劳动受自然必然性规定的有限自由的地基上,还有更高水平的自由,即只服从自身目的的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由。马克思的自由观在西方思想史上扬弃了关于自由问题的"古今之争",蕴含着对物质生产、科学和艺术与人类自由的深层关系的历史性洞见,并产生了深远的当代思想效应。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由观;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B 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4-0047-09

自由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在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发展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理论基础作用。这一思想历程蕴含着一些贯穿始终而又不断演变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代境遇如何发展并限制着人类自由?反过来说,作为一种发展趋势,自由本身是否构成了现代性的历史界限和超越趋势?统而言之,青年马克思更多地将自由当作价值悬设甚或形而上学根据,用来评判和矫正历史进程。而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持续深化,成熟马克思则更多地将自由首先理解为特定的历史趋势、潜能与界限,然后再从中合理抽象出自由的价值维度。同时,马克思始终聚焦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诸种类型(如劳动、交往、科学、艺术)与人类自由的历史性关系问题。各种实践活动的自由发展既是马克思自由观关注的核心对象,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主题。正是以此为理论枢纽,马克思得以将自由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化发展了自由观,将自由追寻内化于历史科学。由此,马克思思想呈现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观发展的诸种阶段性主题。这些主题之间既是历史性的发展关系,又是逻辑性的结构关系,蕴含着独特的发展逻辑。

一、自由之追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生

从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看,自由主题的发生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激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生。自由之追寻,作为基本思想主题引导青年马克思从自我意识哲学进入政治国家领域进而市民社会领域对自由的现实条件与可能趋势进行探究,由此也激发了对市民社会的科学的研究,引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生。相应地,自由范畴也就从自我意识的精神自由、理性国家中的自由理性发展为市民社会中扬弃异化的人类自由自觉活动,进而深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扬弃进程中的自由个性潜能和自由王国趋势。

青年马克思自由观的发生,起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领域分析与整全性自由观的形成。青年马克

收稿日期:2022-03-15
作者简介:郗戈,男,陕西商洛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当代阐释"(项目编号:19AZX002)。

思将“现代自由”的界限指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同体与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裂”,并着力探求一种整全性的自由。具体来看,从大学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自由观的萌生阶段。马克思首先立足于自我意识哲学张扬激进的主观性自由,力主哲学与世界的斗争与化合,而后逐步落实到普遍性的理性国家建构;再通过物质利益难题的思考,审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现代领域分化,探究整全性的社会自由。尤其是《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将“现代自由”的实现形式理解为“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天赋人权形式,并力图深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分裂而探究其历史局限性。为什么《论犹太人问题》能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与公民、人权与公民权的分离诊断为一种“对抗性分裂”,并提出了扬弃二元分裂的总体性社会方案?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依据于一种近似古典古代的人性界定与自由概念:人的本性首先是共同存在性(政治性、社会性);人的真正自由是超越了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二元分裂的整全性自由。他在此后多次援引化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概念,就是明证。① 同时,马克思没有完全倒向古典人性概念中政治性对个人利益的压抑,而是继承了近代自然权利论对个人经济活动、物质利益的强调。马克思试图扬弃所谓古代人的自由(参与公共生活的集体性活动)与现代人的自由(捍卫个人利益的私人性活动)的二元对立,走向一种整全性的自由观。要言之,自由的普遍性活动领域是此时马克思思考的关键:脱离公共生活的私人活动、私有财产只是一种抽象的、残缺的自由即“法权(德文 Recht)”;只有公共生活与个体生活的统一,才能产生出普遍性的自由。然而,这种普遍性自由观运行于抽象的人性预设层面,还需要在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呈现的劳动、交往等实践活动形式中得以历史化和具体化。自由观在社会领域分析中不断发展,势必要深化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市民社会的科学透视。

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确立,是马克思自由观的初步发展阶段。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上述现代社会领域分析中的自由追寻逐步深化为市民社会批判与“类活动”或实践活动的自由潜能之发掘,从而为科学实践观本身的确立以及从实践观出发探究自由主题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发现“现代自由”局限于劳动和交往的异化形式之中,并力求释放这些异化实践中的解放内涵。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马克思得以在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过程的“生产逻辑”视野中理解自由问题,将整全性“自由”概念与“实践”概念特别是“劳动”概念本质性的关联在一起,并着力探讨矛盾性实践中的自由潜能。

首先,《巴黎手稿》通过发掘市民社会中异化劳动、异化交往等实践活动内含的解放潜能,给人类自由确立了一个人本学(或人类学)的生存论根基。进而,通过对英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呈现的经济事实的分析,马克思区分了现代劳动、工业与科学等实践活动中服从自然必然性的“外在有用性”内涵与服从内在自由原则的“自我实现”内涵,进而区分了其中的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将自由奠定在扬弃异化的解放趋势之上。例如,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分析道,“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② 这种矛盾分析,显著地化用了启蒙主义唯物论、功利论的自由概念(满足需要的有用性和工具性)、浪漫主义的自由概念(生命表现和物我合一)以及黑格尔对二者的综合(自我生成与自我实现、总体性的占有和享受)。由此,马克思体现出一种超越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倾向,然而这必然包含种种困难。第一种困难在于,黑格尔能够通过超越人类有限性的绝对精神将启蒙主义的有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7 页。

用性要求与浪漫主义的生命表现整合起来,而马克思如何能够在人类的劳动和交往等有限性存在方式中将这二者整合起来?至少从《巴黎手稿》所预设的“类”的人本学来看,这种整合的要求显然难以实现。这集中体现在,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最终只能依靠近似黑格尔辩证法的“类本质异化史观”来予以把握。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虽然借助感性世界、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概念强调自然存在不能还原为自我意识的客观前提性,但不得不以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本性)与类生存(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先验同一性来保证上述所有矛盾的和解和人类的自我实现,因而始终无法逃出“原初自由的类本质——类本质异化——类本质自我复归”这一黑格尔主义思维模式。要言之,《巴黎手稿》尽管将自由问题置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提供的经济事实领域,但自由问题的展开和解决仍然束缚于一种黑格尔式思辨框架之中,仍然处于先验类本质与客观事实的“双重逻辑”的纠缠之中。第二种困难在于,青年马克思能否合理地要求劳动或物质生产像科学和艺术一样以“生命表现”和“自我实现”为目的,而让“有用性”和“工具性”服从于这一目的,或者说超越物质需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显然,此时的马克思只是思辨地触及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然必然性”维度和“内在目的性”维度的差异问题,但是由于对劳动概念的人本学化和思辨化处理而不能正确地将这一问题呈现出来。

为了克服上述理论困境,《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对启蒙主义传统内部的两种自由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力图扬弃,进而提出一种不依赖于人本学先验预设而扎根于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历史性自由概念。在“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注意到自由问题上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之间的深刻对立。他指出,“哲学家们至今对自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把它说成对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境况和关系的权力、统治,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关于自由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另一种是把它看作自我规定,看作脱离尘世,看作精神自由(只是臆想的),所有的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德国唯心主义者关于自由的说法就是这样的。”①作为英法启蒙派的主流倾向,唯物主义将自由视作一种支配自然外物的“权力”及其正当性即“法权”(权利或所有权)。而作为德国启蒙派的主流倾向,唯心主义则将自由看作一种超越自然必然性的自我决定、自主自律。由此,马克思提出“真正解放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个人在自己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第二个因素是:在谋求自身解放的个人身上至今只作为天资而存在的那种能力,现在被肯定为真正的力量;或者已经存在的某种力量由于限制的取消而增大起来。”②这其实就体现出一种立足于人类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天资潜能生成为现实力量的历史性自由概念。

然而在这一阶段,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还不够深入,马克思的自由观还没有完全超越对劳动或物质生产的“浪漫化”想象。无论是《巴黎手稿》关于超越物质需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物质生产的人本学预设,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劳动成为自由自主活动、自愿分工和自由轮换的未来预见,都说明马克思还囿于劳动、科学、艺术等诸种活动彼此平等交换的现代自然法权和商品物化观念,还没有合理辨析服从自然必然性的物质生产(有用性劳动)与只服从自身目的的“自由的精神生产”(科学、艺术)的界限和等级,没有就工具性活动与自我实现活动对于人类自由的不同意义做出历史定位。

《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自由主题的探究,遗留下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人类诸种活动形式都扬弃了异化,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自主,那么诸种活动是否具有彼此相等的、同质的自由潜能?质言之,劳动作为本质性的工具性活动,服从于自然必然性,能够像科学、艺术等“自由的精神生产”一样只服从于自身内在目的而具有真正的自由属性么?这一问题引导着从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47 页。

学实践观、唯物史观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发展,并最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诸种活动形式的不同发展趋向的分析而获得阶段性的解决。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与人类诸种活动的自由潜能

虽然青年马克思的自由观引导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但后者一旦形成就反过来构成了自由观的日益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逐步成熟,市民社会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批判中的自由问题探索,经由科学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中介,就逐步深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中诸种活动的历史定向这一新主题。上述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深化发展,集中体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对象从"市民社会"(德文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到"资产阶级社会"(德文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法文 la société bourgeoise)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德文 die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的深化过程。① 市民社会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批判主要停留在交换流通关系、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现实表层关系上,还有待于深入资产阶级社会更深层的"生产域",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更具体的剖析,由此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特定性概念应运而生。进而,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对象的深化也带动着自由观的"问题域"的持续转换:从批判现代市民社会的抽象的自由权利即私有财产权,进展到异化劳动和异化交往及其扬弃即自由自觉的类活动,而后在历史特定性视域中透视自由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分离与结合,深刻触及现代社会的根基即资本统治及其范围内的自由发展问题。

从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到《资本论》初步完成,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深入发展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中,马克思将现代自由的界限诊断为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或"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②"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③,并力求从资本逻辑内部发现和释放"自由王国"之趋势。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再现了资本逻辑与人类自由的历史性纠葛。

首先,《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对资本逻辑的矛盾性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蕴含的自由活动之可能性。这种分析包含三条相互交织的思路。第一,自由条件的孕育,主要指资本生产中自由时间之创造和游离。随着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大量剩余时间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并有可能转换为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可用于科学、艺术等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实践形式,从而全面发展人类本性和能力。第二,自由机制的生成,主要指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化、科学化及主体化趋势,以及劳动者整体对自然社会化过程的支配能力不断增强的趋势,人类日益表现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主体。第三,"自由"劳动与真正的自由活动、意识形态生产与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历史性区分。与青年马克思不同,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超越劳动的浪漫化或理想主义理解方式,转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趋势中区分扬弃了异化的自由劳动和真正的自由活动。虽然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物质生产方式总是制约着特定的精神生产,然而二者间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结构相适应的一定精神生产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表现出明显的受制约性,而与此不同,"一定的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如科学和艺术则表现出显著的独立性,甚至直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抗:"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④此处引人瞩目地强调了自由的精神生产对于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制约作用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从而预示了超越资本主义生

---

①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市民社会"话语实践的历史发生构境》,《东南学术》2021 年第 1 期,第 13—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4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6 页。

产方式的“自由王国”范畴。

进一步地,《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再现,揭示了资本逻辑中孕育的“自由王国”即自由活动领域之生成趋势。马克思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两种活动领域历史地区分开来,又共时性地关联起来,从而设定了一种人类活动的自由等级。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 在合乎人类本性、社会潜能与自由创造性的等级上,“自由王国”高于“必然王国”。也就是说,科学与艺术中的创造性、超越性自由,扎根于同时又超越于劳动中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有限自由。这是因为,科学与艺术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超越了自然必然性和外在有用性,仅仅以人类活动自身为内在目的,本质上是人的本性、潜能和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如果说劳动活动服从自然必然性即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生命再生产,其目的主要存在于活动自身之外,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实践”活动的话,那么,科学和艺术就是扬弃了自然必然性、超越于物质生活需要,其目的仅仅存在于活动自身之中的“超实践”活动。笔者所谓“超实践”就是指“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科学,等等)” ②的自由活动。显然,不同于青年马克思,成熟马克思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即使人类诸种活动形式都扬弃了资本统治,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自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仍然也不具有相同的自由潜能。“自由的”物质生产本质上仍然服从自然必然性和外在目的,并不具有自由精神生产那种只服从内在目的的真正的自由属性。

需要追问的是,区分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两个活动领域的标准是什么? 显然是作为内在目的的人类能力发展的程度,相应地还包括人的外在自然(自然存在)与内在自然(人本身的自然存在)的社会化程度、发展水平以及自主性程度。必然王国的实质是人化自然中服从自然必然性的部分,即人受制于自然必然性,同时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合理支配力的发展范围。自由王国的实质则是人的社会化了的内在自然的充分自主发展,尤其是现实的诸个人之间的自然差异经由实践和教化而历史地发展为“自由个性”。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界分与关联,恰恰构成了关于人类实践活动诸种形式合乎人类发展内在目的的一种等级秩序。也就是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制约作用,并不等于物质生产是最合乎人类能力全面发展的“最高级活动”,而仅仅表明,物质生产是人的发展中最基础性、最具制约性的活动形式。而最合乎人类发展目的本身的“最高级活动”只能是自由的精神生产即科学和艺术。因此,我们不能将各种生产活动形式都抽象同一化为“实践一般”范畴,而是必须在科学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区分“根本制约性的”生产活动形式(基本实践形式)和“真正自由的”生产活动形式(“超实践”形式),从而形成人类活动从自然必然性向真正自由跃迁的等级秩序。由此,才能真正理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刻意蕴。

可以说,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思想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本人自由观的“拱顶石”,也超越了西方自由思想传统而达到了人类自由思想的高峰。从思想史上看,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思想正是位于西方思想传统中自由与必然性关系问题的发展主线之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人类活动,并将理论思辨作为超越于实践行动、制作劳动的最高级的、最自主自足的活动形式。及至近代,康德区分了自然必然性与自由,并做出了技术实践(劳动)与自由道德实践的领域划界。而黑格尔力图以精神内在的自由本性及其历史展开的必然性、自我意识外化为劳动的概念运动,来中介上述技术实践(劳动)与自由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9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从而达到必然性和自由的终极调和。康德界分二者的理智方式与黑格尔调和二者的思辨方式,都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和扬弃。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思考并力图超越出来:一方面将自然必然性王国(劳动及整个物质生产领域)与自由王国(科学艺术等自由精神生产领域)划分开来;另一方面,拒绝将两个领域的界限固定下来,通过二者之间的结构制约性和实践中介运动而始终保持着一种生成性、开放性、流动性的界限。因此,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不能理解为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与本体界两个领域之间固化的界限而坚守其差异性,也不能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自我认识过程的内在环节而消融为同一性,而是一种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生成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

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在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中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要言之,必然王国的发展逻辑在于,包括资本统治在内的各种经济权力从压迫性、支配性的力量,转化为单纯的经济基础。进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本身也表现为,从针对资本统治的“否定性自由”走向自由个性生产的“肯定性自由”的趋势。

从社会生产目的演变角度可以透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资本逻辑的地位转换。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古代社会的生产以使用价值和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在根本上服从于人的生存需要的自然必然性。现代社会生产则以价值、交换价值及资本增殖为目的,在其中自然必然性受资本逻辑中介而转化为一种统治人的、异己的、外在必然性。而未来社会的生产则以人本身的才能和力量的发展为目的,服从于自由个性及其发展需要。其中自然必然性虽然扬弃了资本统治的异化形式而在社会理性调节下受到人的自觉支配,然而仍然是一种自然必然性,不能完全化约为人的理性自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① 要言之,即使扬弃了资本统治,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自由只能是一种理性调节自然必然性的“自由”,始终不能越出自然必然性、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和满足生命再生产需要所规定的界限。进而,“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② 而人的真正的自由自主活动则始终在一个受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的范围内发展,这就是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的自由王国。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自由观的理论意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化发展了自由观,进而提出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思想。这一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扬弃了关于自由问题的“古今之争”,蕴含着对物质生产、科学和艺术与人类自由的深层关系的历史性洞见,产生了深远的当代思想效应,集中体现了马克思自由观的精神特质和理论意蕴。

(一)对自由问题“古今之争”的扬弃

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自由观回应了西方思想传统中关于自由问题的“古今之争”即古代的“自然差异—政治等级”秩序与近现代的“自然平等—政治平等”原则的对抗,并创造性转化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多种思想资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8—9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9页。

具体来说,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思想的旨归是自由王国中的自由个性原则;而理解自由个性范畴的关键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把握“自然差异”“自然平等”与“自由个性”这三者的关系。第一,马克思的自由个性观点并不否定古典古代思想家所强调的人与人天赋上的自然差异,而是要提升自然差异,使之成为社会化的自由个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或天性区别,主要是个人之间在自然天资、社会潜能上的差异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自然差异并不是先天预设、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世代更迭的历史过程继承下来的,并且日益发展为自由个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思想家所理解的“自然差异”和“自然正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混淆了自然性与社会性,将历史地形成的甚或思辨地构想的社会等级秩序误当作“自然正义秩序”。与上述古代思想家不同,马克思科学地区分了自然与社会,同时并未走向自然性与历史性的二元对峙,而是扬弃二者的对立,达到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应当注意,马克思所谓“必然王国”也不是指纯粹的、非历史的自然必然性,而是指一种历史地形成的自然必然性,是特定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人们以一定的物质手段来满足一定的生存需要的那种必然性。由此,马克思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并不能直接生成经济分化结构和政治统治秩序(如阶级、政治等级等),因而不能为后者提供正当性根据。自然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反而受制于特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秩序,因而现实的个人总是表现为“偶然的个人”即受制于出生时既定的阶级条件的个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从自然差异推导出正义秩序,而在于改变那些扭曲个人天资的现实发展的既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使天资和潜能能够全面发展为自由个性。第二,马克思的自由个性观点超越了近现代思想家所强调的自然平等和权利平等,认为自由平等权利本身并不能直接发展出自由个性,并将自由平等权利仅仅理解为自然差异提升为自由个性的过渡性中介条件。霍布斯、洛克、斯密等近代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基本预设是,人的自然平等(而非自然差异)构成了“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理论表达)的规范前提,并支配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中深刻地指出,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法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流通”表层的观念再生产,并为其深层的生产方式提供意识形态辩护。进而,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预见了共产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在彻底超越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自由个性规定的“按需分配”扬弃类似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按劳分配”及其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形式,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可见,马克思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思想同时超越了古典自然正义论与现代自然权利论,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潜能论的自由观。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社会分工即个人被固定在特定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领域,根本上受制于特定生产关系结构和阶级分化。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固化,使得个人不能在这种强制分工中充分发展自然天资和社会潜能。对于这一问题,古典的自然正义论与近代的自然权利论都热衷于争论人的自然本性是否平等,恰恰遮蔽了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实现自然天资和社会潜能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过程,因而纷纷沦为对强制分工和阶级分化的抽象抨击或道德辩护。而马克思则揭示出这种活动领域固定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并预见到,通过资本逻辑的扬弃与必然王国的合理发展,个人在天资与潜能上的差异性能够全面发展出来,成为现实的力量,实现为自由个性。

由此,马克思的自由观创造性转化了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代思想资源,同时又对古典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汇通了人类古今思想的精华。如上文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自由观进行了区分,而相较而言,必然王国范畴近似于英法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即人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支配权力的发展。而自由王国范畴则近似于德国唯心主义的自我决定概念与浪漫主义的生命表现概念即人的社会化的内在自然的充分发展、个人间的自然差异社会地发展为自由个性。而关于自由王国高于必然王国的自由程度等级概念,则又近似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思辨——实践——制作”的人类活动类型的等级秩序。对此,当代西方思想家如海德

格尔只看到了马克思对思辨高于实践、制作的古典秩序的“颠倒”,但是并未理解马克思将“超实践”(科学、艺术)看得高于“实践”(劳动)的这种对古典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及其向古代崇高观点的更高程度上的“复归”。

(二)对劳动、必然性与自由问题的洞见

从当代思想来看,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自由观包含着对现代物质生产、科学和艺术发展与人类自由的关系的历史性洞见,并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当代思想效应。

对于马克思自由观的深邃内涵的各种教条化或肤浅化误解,在一定意义上诱发了后世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的持续批判、“重构”或“发展”。例如,海德格尔对“生产主义”的批判、马尔库塞以艺术取代劳动作为解放力量的矫正、阿伦特对劳动与行动的混淆的批判、哈贝马斯对劳动与交往关系的重估等,虽然都有一定的学理深度和思想创新,但其实都没有合理把握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深蕴。从理论逻辑上看,上述针对马克思自由观及劳动—实践观的批判都围绕着一个基本前提而展开,这就是劳动、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阿伦特就认为,劳动是受生命必然性制约的,而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摆脱,二者的领域界限不能混淆,自由的实现要靠超越于劳动的政治行动,在参与政治生活中实现;而马克思自由观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不理解劳动与生命必然性的本质关联,从而混淆了劳动与超越生命必然性的行动,把劳动误当作人的实践即本质性活动方式。

阿伦特的这一批判可以说命中了青年马克思基于先验人本学对劳动的浪漫理想化构想,但是却遮蔽了成熟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劳动的更具历史科学性的认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劳动、必然性与自由关系的理解显然比阿伦特关于自由与必然性二元对峙的观点更为复杂和深刻。按照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区分,劳动解放与真正自由活动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劳动显然是受自然必然性及生命再生产需要制约的,并非真正意义的上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活动;即使是扬弃异化的劳动解放也仍然是以劳动活动之外的人类再生产需要为目的的。而且,马克思还区分了自然必然性即人类的使用价值需要的客观规律和“异己的必然性”即资本价值增殖的客观逻辑。因而,劳动的解放和自由,首先表现为对资本统治的历史必然性的扬弃,进而表现为对自然必然性的理性调节和自觉支配。在劳动受自然必然性规定的有限自由的地基上,还有更高水平的自由,即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由。没有必然王国中的有限自由的奠基,也不会有自由王国中的全面的自由。显然,阿伦特把劳动必然性与行动自由这二者抽象对立起来,看不到必然性的复杂内涵和自由活动的等级层次,更看不到二者间的历史的、具体的生成性关联,从而拘泥于抽象划界的独断论观点。而马克思在历史性视野中洞察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中形成的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由等级,科学地把握了劳动、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历史生成论关系。

结　语

自由问题是数千年人类文明一直求索的“永恒主题”之一,虽然启蒙运动以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直妄图垄断自由的价值规范与话语权力,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则打破了这一话语垄断权力并产生出更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人民性的自由观,尤其是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自由观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鲜活的理论生命力与深远的实践价值。从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高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从始至今的发展都主要是物质需要的自然必然性或资本增殖的异己必然性水平上的发展。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对自我保存权利的兑现,到追求幸福舒适权利的垄断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基本上都没有逾越必然王国限定的自由界限,却又从中潜在地孕育出扬弃自然必然性与异己必然性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成就。而在充分吸收全球化所带来的现代文明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为人类文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逐步飞跃开辟了康庄大道。

The Theoretical Profound Implication of Marx's View of Freedom in the Vision of the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Xi G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Karl Marx used to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type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human freedom.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freedom was not only the core object of Marx's view of freedom, but also the basic them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aking this as the theoretical pivot, Marx was able to combine the view of freedom with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deeply developed the view of freedom i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lize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in historical science. The overall recurrence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revealed the generation trend of the realm of freedom bred in the capital logic. Marx historically separated such two activity fields as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nd the realm of freedom from each other, and connected them synchronically, so as to set a freedom level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limited freedom regulated by natural necessity on the part of labor,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freedom, that is the creative freedom which is only subjected to its own purpose in science and art. Marx's view of freedom sublates the debate between "classic and modern" about freedo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contains his historical insights into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freedom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as well as science and art, and makes far-reaching effects on contemporary ideology.

Key word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iew of freedom; realm of necessity; realm of freedom; practical activity

(责任编辑　　郭昌盛)